·在陈翰笙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庆祝会上·

胡绳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话

从陈翰老六十年的奋斗历史可看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怎样踏上革命道路的。他在学术上刻苦钻研，踏踏实实力求对所研究问题作出科学分析；他从来鄙弃华而不实、言之无物的空谈，要求认真实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陈翰笙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早在一九二四年，他从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时，已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决心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一九二五年，他成为共产党员。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遭受重重苦难的时代，陈翰笙同志长期在白色恐怖下的惊涛骇浪中从事革命活动，进行学术研究。他既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又是一个严谨的社会科学家。他的社会活动和学术工作，都是按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需要而进行的。

三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国革命的艰苦时期，革命与反革命的冲突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与这种政治形势相联系，学术界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大论战。为了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陈翰笙同志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特别着重研究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他深切地了解，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村问题。他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倡导对农村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一九三三年，他创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这个组织团结和培育了一批研究工作者。当年参加农村经济研究会的许多同志，后来成为我党理论工作和经济工作的骨干，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同时，陈翰笙同志也对当时中国的财政金融状况，对国民党内外各政治派系的状况进行研究。他还研究帝国主义，包括美国垄断资本的种种问题。

在三、四十年代，陈翰笙同志不但在国内各地进行大量工作，还曾到日本、苏联、印度、美国从事研究和著述，同时从事国际活动。特别是他先后两次在美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陈翰笙同志参与国家的外交工作，曾经广泛地进行外事活动；同时，他仍孜孜不倦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很注意研究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发展史等方面的问题。十年浩劫时期，他身处逆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翰笙同志十分兴奋，他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工作，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名誉所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主编《外国历史小丛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他虽然苦于严重的视功能减退，但仍在别人协助下，坚持收集资料从事写作。

陈翰笙同志现在已经八十八岁。他从二十八岁开始致力于革命，从事学术活动，到今年整整六十年。从陈翰老六十年的奋斗历史可以看到：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是怎样踏上革命的道路，在党的培育下坚持革命、致力于社会科学事业的。因为陈翰笙同志有为革命而献身的精神，因此他在学术上刻苦钻研，踏踏实实地下功夫，力求在掌握丰富知识的基础上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正因为他的著作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因此才能有效地服务于革命事业。在学风上，陈翰笙同志从来都鄙弃华而不实、言之无物的空谈，要求认真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他自己以身作则地坚持这样做。这些就是陈翰老的六十年学术活动值得我们十分尊重的缘故，这也是我们必须向陈翰老学习的缘故。

我们社会科学战线的广大理论工作者，一定要以陈翰笙同志为榜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努力研究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拿出高质量的成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本版编辑　陈鸿斌）

中国社科院向陈翰笙致信祝贺

本报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党委日前在“陈翰笙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庆祝会”上向陈翰笙同志致以贺信，祝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贺信说，六十年来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党所领导的社会科学事业，培养社会科学人才方面，陈翰笙同志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的道德文章也为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出席会议的还有罗俊、洪克平（孙冶方夫人）、陶宇珍（王寅生夫人）和杨锡芬（张锡昌夫人）。

（注：本报上期第三版最后一段中的“外交协会”应为“外交学会”。）

爱德乐代表路易·艾黎讲话

陈翰老是一位在三大洲六个国家积极活动的革命分子。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从不停止将革命活动与学术活动结合起来，从不停止将热忱的爱国主义与堪为楷模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六十年前的今天，陈翰笙教授开始在北大任教。所以，我们要庆祝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革命知识分子六十年来富有成效和创造性的活动。陈翰笙同志曾是一位在三大洲（亚洲、欧洲、美洲）的六个国家（中国、日本、印度、苏联、德国和美国）积极活动的革命分子。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他都从不停止将革命活动与学术活动结合起来，从不停止将热忱的爱国主义与堪为楷模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他在学术上一直富于创造性和创新精神；他一直是一位毫不动摇的富于原则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多年来，他一直毫无倦意地先后为中国的解放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至今他仍处于这场斗争的最前列。而且我敢肯定，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将继续为我们大家树立起一个光辉的榜样。我们大家都祝他长寿。

陈翰笙博士曾发表许多论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土地问题的著作。在他的著作中，我首先阅读的两本是《华南的地主和佃农》及他的论述中国的烟草种植和烟草工业的专题著作。两者都是经典的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文章。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是他发动并组织了人马来写那篇题为《农业中国》的精辟的文章。它发表于三十年代后期。纽约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发表该文一事在当时既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又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因为它彻底地批判了柏克在《中国的土地使用》一文中对中国土地关系所作的资产阶级分析。

约在四十四年以前，我通过我已故的亲密同志和朋友冀朝鼎在香港认识了陈翰笙同志。我仍然记得我首次与他在香港见面时，他讥讽地分析了当时刚由国民党颁布的实物土地税。早在一九四一年，他在不少场合中，就已经是朋友和学生们所公认的传奇式人物。他曾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在上海认识了鲁迅，他还是宋庆龄的好朋友。不但如此，他在日本、美国、苏联和德国还有数不清的朋友。在香港，我在《远东新闻》上读到了他的有关中国政局的精辟的文章。当时他是那个刊物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在香港，我获悉他原来还是“工合”的主要组织者和活动家之一。

此后，我又于一九四四年年初在桂林见到了陈翰笙同志。他于一九四二年初化装成一名店铺老板逃离日本占领下的香港后就一直居住在桂林。后来我听说他于一九四四年到印度避难去了，因为蒋介石要抓他。在一九三五年，他也是靠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的帮助逃离上海的。在他逗留于印度的时候，他仔细地研究了印度的土地关系。我记得读过他于当时发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小册子。那本书于一九八〇年在孟买出版，尽管它是在二十年以前写成的。

在桂林见面六年后，我又与他相见了。那是一九五〇年在美国的剑桥。当时他即将回到解放后的中国。回到中国后不久，陈博士就参加了《中国建设》月刊的创立和出版工作。我于一九五七年首次访问解放后的中国，最后于一九六二年在北京定居，而且有幸首次以同事的身份与陈翰笙同志交往了一段时间。我经常去看望他，一直到十年动乱开始为止。大约在一九七三年或一九七四年初我再次地碰到了他。自那时以来他和我一直经常地相互访问。即使在“四人帮”垮台前夕的最危险的时期，他还是坚持经常来看望我们。

作为一位学者、导师和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陈博士才华横溢，造诣深厚，而在同时他又思路清晰，具有说服力。作为一个热爱行动的人，他很大胆，但又机智谨慎；很坚定，但又很灵活。他热情、坦率、有勇气。他不能容忍虚伪，讨厌愚蠢的人。而在同时，他又非常耐心，宁愿花许多时间去帮助年轻的学生，不管那学生水平如何，只要他真心诚意地想学。没有什么能阻止陈翰笙同志无私地将自己献给他的工作和他的学生。

陈翰笙与他的夫人非常和谐。可惜她在一九六八年那种可悲而又艰难的时期去世了。他的孩子们都对他很孝顺，这是他的福气。而我们大家又都为有他这样一位导师、同志和朋友而深感幸运。我们大家祝您长寿，祝您继续进行有创造性的活动。您已经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深信您将继续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求真求实　刚正不渝

祝贺陈翰笙同志从事研究工作六十周年

吴觉农

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庆祝翰老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同翰老同年，相交已经半个多世纪，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良师益友。我敬重翰老，并非将他看成一个「完人」，但我认为翰老的品德有几方面非常值得钦佩，值得学习。

第一是心向革命，坚定不移。一九三二年，由一位老党员的介绍，我认识了翰老，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严重关头。翰老痛恨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和对日不抵抗主义，但他并不悲观失望，他认为中华民族已经觉醒，中国的前途是有希望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翰老邀我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在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翰老为农经会的生存和进行活动费了不少心血，他的劳绩是很有价值的。在农经会的一些同志的影响下，我在思想上得到不少帮助。一九三一年出国考察茶叶，顺道去苏联访问，目的是去看看社会主义的苏联究竟是什么样的，此行主要是由翰老促成的。抗战期间，我同翰老夫妇在香港、桂林等地多次相会，不论在什么政治和军事的恶劣环境下，翰老对民族前途，对革命的前途更充满了乐观和信心。抗战胜利后，他在美国，他对国内的形势仍十分关心，解放前夕，农经会的老同志张锡昌被捕，他立即来电询问事态的发展，要我们努力设法营救。新中国成立后，翰老夫妇迫不及待冲破重重障碍回到北京，他心情的振奋溢于言表，因为他认为他所期待的为社会主义和建设事业贡献力量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第二是刚正不阿，不图名利。我觉得翰老身上突出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讲气节重操守的优良传统。在敌人面前，翰老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一身不畏强暴的铮铮铁骨。翰老早年就是一位名扬中外的学者，但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绝不同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和一些御用学者为伍，他傲然冷对他们的威逼利诱，绝不向他们低头。十年动乱期间，他又受尽折磨，但他从不向「四人帮」和极「左」势力屈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他一贯的气质。在同志和朋友之间，他服膺真理，习惯于独立思考，不随便附和自己没有想通的问题，不管你是多大的权威，他绝不趋炎附势，但一旦事实和说理使他信服，他又能立即从善如流。翰老从不计较自己的名位，不顾忌个人的功利得失，个人生活俭朴，始终保持一介书生本色。翰老待人真诚，同情受害者。文革期间，「四人帮」剥夺了他搞研究的权利，他就把精力放到培养青年人方面，在他所教的学生中有一些是所谓「黑帮子女」，有人劝他「少找麻烦」，他回答说：「年轻人无罪，我们的未来需要他们。」今天的事实说明翰老的高瞻远瞩。

第三是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翰老一生勤奋，孜孜不倦，刻苦钻研。早在二十年代初，他就在北京大学出版的《现代评论》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国际问题和其他方面的文章，涉及的领域很广，文章处处闪耀着新思想的光芒，表现出翰老在「五四」运动后就是一位思想上的先驱者。翰老从不做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每研究一问题，必定作大量的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认真进行分析。我仅举这样一个例子：翰老早在一九二四年就写过一篇关于鸦片战争前后中英茶叶贸易的文章，全文仅三千多字，使用的资料书刊达五十多种，因此文章立论有根有据，内容充实，掷地有声。当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同志们做了不少挚实的农村调研，可以说是同翰老求真求实的精神分不开的。

以上我只是粗略谈几点感受，挂一漏万，当然不能概括翰老的全貌，谨此向翰老表示我的一点敬意和祝贺，希望翰老在珍重身体的前提下，为四化写出更多精辟文章和著作。